

# 北魏孝文帝的门阀主义

任艳艳

**摘 要** 为了巩固北魏政权对汉族中原地区的统治,魏孝文帝提出门阀主义,并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采取定氏族、门阀婚姻、修撰谱牒、传播汉文化等措施,使鲜卑贵族和汉世家大族进一步紧密结合。

**关键词** 北魏 孝文帝 门阀主义

北魏以一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维持并巩固其对汉族地区的统治并非易事,军事征服之外,文化上的融合、政治上的协调也在其列。北魏孝文帝的门阀主义正是在这一形势之下产生的。而目前对门阀的研究,大多是个案研究,或作为魏晋南北朝整体来进行。除陈爽先生《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伊佩霞《博陵崔氏个案研究》之外,专文论及很少。笔者从孝文帝着手,探索北魏门阀主义及其思想指导下的政策,而这也正是北魏门阀产生的前提。

## 门阀主义与贤才主义之争

《魏书》卷六十《韩麒麟附韩显宗传》和《魏书》卷五十九《刘昶传》详细记载了孝文帝的门阀主义思想,以及孝文帝和李冲、李彪、韩显宗等人关于门阀主义与贤才主义的争论。

《魏书》卷六十《韩麒麟附韩显宗传》:

显宗又上言曰:“进贤求才,百王之所先也。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贤良、方正之称。今之州郡贡察,徒有秀、孝之名,而无秀、孝之实。而朝廷但检其门望,不复弹坐。如此,则可令别贡门望,以叙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门望者,是其父祖之遗烈,亦何益于皇家?益于时者,贤才而已。”

韩显宗的上言说明了三个问题:

第一,“前代取士”,即汉魏时期主要是月旦评,把士的才能、德行放在首位。

第二,“今之取士”,首先看中的是其门第、郡望。

第三,取士,是要选择有才能、有德行的人,贤才才会有益于统治,光凭门第、郡望是不能断定一个人才能高下的,也不会是合理有效的选人用人方法。

《魏书》卷六十《韩麒麟附韩显宗传》记载了高祖与李冲、李彪和韩显宗三人的门阀主义与贤才主义的争论,文繁不录。几经争辩,高祖门阀主义略占上风。其思想大致如下:第一,任官选吏,重在官吏的品行德行,所以选官重点应在高门望族。第二,才能卓越的普通民众甚为稀少,旷代也就一二人而已。第三,对于“高明卓尔、才具隽出者”也并不受门阀的限制,可以破格任用。《魏书·李彪传》记载高祖诏:“彪虽素非清第,本阙华资,然识性严聪,学博坟籍,刚辩之才,颇堪时用,兼忧吏若家,载宣朝美,若不赏庸叙绩,将何以奖励勤能?可特迁秘书令,以酬厥款”。高祖的门阀主义思想在《刘昶传》中有更为集中具体的叙述。

《魏书》卷五十九《刘昶传》:

太和十九年十月,昶朝于京师。高祖临光极堂大选。高祖曰:“朝因月旦,欲评魏典。我国家昔在恒代,随时制作,非通世之长

典。故自夏及秋,亲议条制。或言唯能是寄,不必拘门,朕以为不尔。何者?当今之世,仰祖质朴,清浊同流,混齐一等,君子小人名品无别,此殊为不可。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复有七等。若苟有其人,可起家为三公。正恐贤才难得,不可止为一人,浑我典制。……”

考察魏孝文帝定氏族的全过程,笔者认为其门阀主义,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缘由。第一,北魏鲜卑贵族汉化程度低。从道武帝建国到孝文帝迁都的一百多年间,北魏王朝一直处于不断的征伐战争之中,当他们统一了北方流域之后,与南方的政权对峙,这种改变,如果尚能接受的话,孝文帝迁都洛阳,从游牧向农耕的彻底过渡,让他们接受却不那么容易,于是一大批鲜卑贵族不断反抗,正如王仲荦先生所说:“他们认为鲜卑贵族之所以能够统治中原,就是因为鲜卑人勇悍善战,马背上的生活方式和战斗方式的一致。倘若南迁洛阳,由于生活方式的转变,鲜卑人的气质,也会一天天变成脆弱,失去过去强悍善战的性格和习惯,反而不能统治汉族。所以他们不主张迁都,更反对汉化。”<sup>[1]</sup>第二,汉族门阀士族居多。除了文明太后时期进入北魏政权的陇西李氏、范阳卢氏外,中原地区还有许多名门望族。孝文帝要统治北中国,并意欲征服南中国,必须借助他们的力量。所以从门阀主义入手加强鲜卑贵族与汉族世家大族的结合也是历史的选择。

关于门阀主义与贤才主义,谷川道雄先生在《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也有相关论述,他认为“孝文帝赞成门阀主义的立场是十分鲜明的”。进而指出“孝文帝的门阀主义与其说是单纯的汉化政策,不如说是试图在政治上抹去中国社会传统的门阀主义与北族社会单纯质朴的习俗之间所存在的鸿沟”<sup>[2]</sup>。这一论断指出了孝文帝门阀主义及其定姓族的实质,在于消除北族社会内部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来挽救社会统治的危机。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说:“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sup>[3]</sup>北魏统治者面临的问题正是如此。他们用武力征服了广袤的中原地区,却面临着文化上激烈的冲突。孝文帝提出门阀主义,其目的也就是借用汉文化来发展自己民族的文化,减少甚至消除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

## 孝文帝门阀主义政策

孝文帝清楚地认识到北魏社会内部的这一深层矛盾,积极寻求解决办法。从魏晋以来汉族门阀成为社会的一股力量,孝文

帝自然把门阀主义作为调解社会矛盾的切入点,于是在其指导下的一系列政策脱胎而出。

第一,孝文帝定姓族。其内容许多学者已有论述,这里不再赘述。孝文帝迁洛以前,门阀主义与门阀主要在南方地区,北方地区除了一些原有的世家大族外<sup>[1]</sup>,在北魏统治集团中几乎是不存在的。因为门阀的构成至少需具备三方面条件:政治上累世居高官,经济上为剥削他人的、有依附民的封建地主阶级;文化上具有世代相传的浓厚的家学家风<sup>[2]</sup>。在当时北魏统治集团内部,除了少数汉族郡望外,鲜卑贵族有的或具备政治上累世居高官的条件,但其经济文化层面的要求却难以实现,因而不能称为门阀。这样,北魏统治者就不得不调整其统治策略。这使二者在门阀主义思想的统率下暂时地融合在了一起。

第二,门阀婚姻。先是孝文帝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琰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陇西李冲以才识见任,当朝贵重,所结婚连,莫非清望;帝以其女为夫人<sup>[3]</sup>,开了门阀婚姻的先例。又咸阳王熙娶了一个隶户的女儿为妻,孝文帝谴责了他,并下诏为六弟聘室,前者所纳,可为妾媵。咸阳望熙,可聘故颍川太守陇西李辅女;河南王干,可聘故中散大夫代郡穆明乐女;广陵王羽,可聘骠骑谘议参军荥阳郑平城女;颍川王雍,可聘故中书博士范阳卢神宝女;始平王颺,可聘廷尉卿陇西李冲女;北海王详,可聘吏部郎中荥阳郑羲女<sup>[4]</sup>。献文六王除河南王干娶的是“勋贵八姓”之一的穆氏之女外,其他五王均缔结姻亲于汉族大姓,因此和汉族大族姻亲成为孝文帝笼络汉族大族,维持汉人、代人统治平衡的一个砝码。在孝文帝的倡导之下,鲜卑贵族与汉族大族的联姻迅速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说:“对于骑士和男爵,以及对于王公本身,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sup>[5]</sup>

第三,文化的隆兴。陈寅恪先生指出,魏晋之后“公立学校之沦废,学术中心转移于家族,太学博士之世业变为家人父子之世业,所谓南北朝之家学者是也”<sup>[6]</sup>。南北朝社会家学兴盛远过于国学,北方大族如清河崔氏、陇西李氏等保留了“自东晋迄南齐,其所继承汉、魏、西晋之遗产”<sup>[7]</sup>。汉文化对孝文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本人即“雅好读书,手不释卷”<sup>[8]</sup>,而且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孝文迁都洛邑,借书于齐,秘府之中,稍以充实”。他让太子学习汉文化,并重用从南朝归亡的汉族士人。又《魏书》卷二十一《献文六王列传·广陵王羽传》有:“高祖引陆贽、元赞等于前曰:‘北人每言北人何用知书,朕闻此,深用恍然。今知书者甚众,岂皆圣人。朕自行礼九年,置官三载,正欲开导北人,致之礼教。朕为天子,何假中原,欲令卿等子孙,博见多知。若永居恒北,值不好文主,卿等子孙,不免面墙也。’”北人“即鲜卑等少数民族,居于代北,故称北人。他们不习礼教,所以孝文帝欲令以礼教教育北人,从而提高北人的汉文化素养,更好的统治汉族地区的人民。孝文帝还‘亲丧丧服于清徽堂’<sup>[9]</sup>,上行下效,“暨夫太和之后,盛修文教,缙绅硕学,济济盈朝,缝掖巨儒,往往杰出,其雅诰奥义,宋及齐、梁不能尚也”<sup>[10]</sup>。

第四,谱牒的修撰。一是皇族谱牒,一是大族谱牒。皇族谱牒是历朝封建统治者取得正统地位以后,设专官修撰,以此来炫耀皇族的显赫地位,彪炳其统治的合理性。孝文帝迁都洛阳

以后,也进行了皇族谱牒修撰。《隋书·经籍志二》列有《后魏皇帝宗族谱》《魏孝文列姓族谱》和元晖业撰《后魏辨宗录》,《新唐书·艺文志二》《旧唐书·经籍志下》有《后魏谱》。大族谱牒一是孝文帝为代人各大姓族制定的谱牒,一是各望族私修的谱牒。后者在家学兴盛的南北朝尤为普遍,而且也是许多不屈于鲜卑统治之下的汉人“坚守华夷之别的最后手段”<sup>[11]</sup>。本文仅论前者。太和十九年孝文帝发布诏令“令司空穆亮、领军将军元俨、中护军广阳王嘉、尚书陆修等详定北人姓,务令平均。随所了者,三月一列簿帐,送门下以闻”<sup>[12]</sup>。此即孝文帝设立专官来为代北之人官修谱牒。据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魏收“大征百家谱状,斟酌以成《魏书》”<sup>[13]</sup>。可知北魏撰修谱牒的规模之大,流行之广。这一时期官修谱牒很多,并设有专门的主谱官员“宗正卿”,而且宗正卿的任免要“用懿清和识参教典籍者担任”<sup>[14]</sup>;“先尽皇室,无则用庶姓”<sup>[15]</sup>。

孝文帝门阀主义思想及其一系列政策的推行,在北魏统治集团中形成了一个门阀序列,鲜卑贵族逐渐汉化与汉世家大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唐代最高门阀是崔、卢、李、郑、王五姓七家,获得这个崇高地位即在太和定姓族时”<sup>[16]</sup>。北魏门阀存在的时间虽然是短暂的,但孝文帝门阀主义的影响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 参考文献:

- [1]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12):541.
- [2][日]谷川道雄著.李济译.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0).
-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九卷).人民出版社,1956:247.
- [4]北齐书(卷二十三).崔凌传.
- [5]周谷城.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82(12):142—148;陈爽.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2):189.
- [6][7]资治通鉴(卷一四).齐纪六.明帝建武三年(496).
-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4).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56,91—92.
- [9][10]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华书局,1963(5):19,11.
- [11]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
- [12]魏书(卷二十一).献文六王列传·彭城王传.
- [13]隋书(卷七十五).儒林传序.
- [14]李传印.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与政治的关系.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4(8):93.
- [15]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
- [16]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浦起龙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1.
- [17]王钦若.太平御览(卷二三).职官部引后魏职令.
- [18]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5):83.

任艳艳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硕士研究生  
(责编 高生记)